

Chinese Frontier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中文学科：文化强国战略下的突围和发展

全球化语境下中文学科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丛书笔谈

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若干问题答客问

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史料意识与学术创新

论文章学视野中的“宋体四六”

两宋所传词集再考

皎然对属论研究

关于“人生论美学”的对话
——王元骧教授访谈录

族谱资料所显示的底层文人的阅读选择与感受

汉语“V_双+N_单”结构歧义的认识研究

中文学术前沿

第三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Chinese Frontier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中文学术前沿

第三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文学术前沿. 第3辑/《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308-09659-1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社会科学—丛刊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6250 号

中文学术前沿(第三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366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659-1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目 录

“中文学科建设：历史经验与全球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丛书首发式特辑

【会议主题发言与述评】

中文学科：文化强国战略下的突围和发展

——以浙大中文系及“系史”为契入点的一种探讨…………… 吴秀明(1)

全球化语境下中文学科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中文学科建设：历史经验与全球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张广海 楼 培(5)

【《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丛书笔谈】

百年缩影

——读《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有感…………… 李隆献 刘文清(12)

中文学科奋进中的回望与探寻

——有感于《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出版…………… 赵世举(16)

学术血脉的铭记和承接

——初读《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 陈 坚(19)

二十世纪文学史

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若干问题答客问…………… 严家炎(23)

痛苦的母亲

——对王独清《圣母像前》与基多·雷尼《戴荆冠的基督》的思考……………

…………… [斯洛伐克]马利安·高利克(27)

当代文学史料学

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史料意识与学术创新…………… 郭剑敏(38)

“活的文学史”

——论当代文学口述史料…………… 何怡洁(45)

“潜在写作”的文献史料问题再探…………… 陈小霞(55)

古典文章学

- 论文章学视野中的“宋体四六”..... 祝尚书(64)
《唐程修己墓志》的文本释读与价值论衡..... 胡可先(76)

古典诗词学

- 两宋所传词集再考..... 王兆鹏(86)
皎然对属论研究..... 卢盛江(97)
赵秋谷之白傅论平议..... 陈才智(104)
杜甫《丽人行》名物考释图证..... 武晓红(114)

名家访谈

- 关于“人生论美学”的对话
——王元骧教授访谈录..... 王元骧 赵中华(126)
王元骧文艺思想述评..... 郑玉明(133)

系史补遗

- 倪立民小传..... (146)

古典文献学

- 族谱资料所显示的底层文人的阅读选择与感受..... 张廷银(147)
《周礼正义》(春官)标点商榷..... 汪少华(163)
关于陆心源手校本《政经、心经》..... [日本]芳村弘道(173)

语言文字学

- 汉语“V_双+N_单”结构歧义的认识研究..... 方环海 王 梅(176)
湖州话中的词语“百坦”新议..... 池昌海 王艳秋(185)
澳门崇源新见楚青铜器刍议..... 宋华强(192)
《蒙古字韵》“穹”、“倾”同形异音探析..... 宋洪民(202)

中文学科：文化强国战略下的突围和发展

——以浙大中文系及“系史”为契入点的一种探讨

吴秀明*

内容提要：当前中文学科在获得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而程度不同地被边缘化了，陷入了某种困境。大量事实表明，中文学科正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特殊的历史“拐点”上。在“经济中心”时代，中文学科要想返回引领风骚、独占鳌头的辉煌时代，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但经过我们的内外兼修，在现有基础上有所改善和提高，这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现在的关键是要立足现实，背靠历史，面向世界和未来，寻找文化强国战略下的突围之路。我们编撰中文系史，总结有关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目的是为了推进它在当下更好发展。

关键词：中文学科；系史编撰；历史拐点；突围之路

我系这次召开“中文学科建设：历史经验与全球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话题，源于这套刚出版的三卷本的《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丛书。三年来，在深入历史，触摸浙大中文系与学校一起走过的风雨沧桑的近百年历史，翻看那些发黄的照片、手迹、手稿、书画，特别是夏承焘、姜亮夫等老先生留下来的至今仍代表浙大中文系最高学术“标杆”的精品力作，重温他们那温煦的、充满人文气和富有弹性的精神生活；再反观当下中文学科的生存状态，我们在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光的同时不能不感慨良多，涌上了一种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一种喜忧参半、忧大于喜的复杂心情。

一方面，我们看到随着国家提出的文化强国战略的加速推进和高等教育事业的突飞猛进，中文学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并由原来比较单一的综合性、师范性学校向工商农林等专科性乃至二级学院、职业学院等多种类型的学校拓展，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办有中文系，以至到了遍地开花的地步。中文是关于语言文学及其内蕴的意义、情感、审美探寻的一门学科，是构建和提升学校整体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平台。也因这个缘故，80年代中期的清华大学、原浙江大学等工科背景的名校纷纷创办或恢复中文系。浙江高校也不例外，中文系从“文革”前的小数几家，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发展到了30余家。其中有的还具有研究生学位授予权；有的办学历史虽不长，但由于在各方面尤其是在人才引进方面行“非常之道”，推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特殊“吸引”政策，因而迅速从无到有，由弱至强。这就有效地改变了原有的中文学科几家经营的狭小格局，使之在整体上呈现出了人兴丁旺、立体多元的发展态势。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扶持包括中文在内的传统基础学科，国家通过文科基地、211工程、985专项经费，还有每年都在“行情看涨”的国家社科基金，以及各地各层次各种各样的文化工程，给中文学科以相当力度的经费资助。而中文学科呢，在上述时代精神气候的影响和推动下，当然也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亦在诸如学科国际化、规范化，学科与时代社会，学科与学科之间合作、学科内部之间的合作，学科团队的组建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

* 吴秀明，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成就。以上这一切,我们都应该正视并给予充分的肯定,任何的抹煞和妄自菲薄,都是不合适的,也有失公允。

但另一方面,也不必讳言,这之中的确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甚至相当严重。有关这些,近年来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各个不同的层次,大家是有议论有批评的,有的还颇为尖锐。如学术评估指标化即通常所说的“量化”指标,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它开始表现在“研究成果”上只讲“量”而不求“质”,并因此制造了一大批学术垃圾或准垃圾,也催生了许多学术腐败和学术造假。不过,这些年来这个问题有所淡化,教育部在近期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改正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意见》文件(2011年11月)中对此也提出了带有纠偏性质的规定和要求,它似乎逐渐被另一种新的“量化”指标所取代,这就是“研究课题”的“量化”。国家出资设立研究课题项目,目的是为了支持人文学科(从精神到经费的支持),这种支持,的确也催生了一些好的成果,并对人文学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当我们的管理层将它强行纳入一种刚性的“量化”指标体制,作为衡量和考察某个人或某个学科学术成就和水平,并将其与个人和单位利益如职称、硕博点、学术和专业评估等要命的利益直接挂钩,这就程度不同地变味了:它有意无意地诱导和迫使不少人抛弃本来应修的“内功”,而去从事不熟悉也不愿做的“外功”,走出安静的书斋去“跑课题”。这样的结果,遂使原来最重要的“研究的结果”即成果不重要了;相反,“研究的过程”则被不适当地夸大而显得很重要,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长此下去,对个人和学科的学术发展是不利的。目前国内申报的研究课题一般都要求在一两年内完成,而不少研究者迫于生存,往往同时承担了好几个研究课题。所以为了结题,疲于应付,整天忙得团团转,借用早些年有人所形容的“被逼得连撒泡尿的工夫都没有”。在这些新的衡量指标的管束下,人们似乎很难潜心学问,更不用说以“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精神,心无旁骛地潜心学问。这是不能单纯怪研究者的,也不能拿他们的“道德”说事。说实在的,假如中文系的夏承焘、姜亮夫等老先生再世,恐怕也无能为力——不仅难以写出被我们今天奉为“经典”的传世之作,弄得不好,甚至有可能被我们建立在“量化”指标基础之上的体制“下岗”了。为什么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在内的各种研究课题项目大多不能按时结题,从中产生的佳作不多,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

需要指出,这几年研究课题申报中开始加大了“后期资助”的力度,这说明自上而下都看到了问题并开始着手在进行调整,也说明我们上述的担忧并非多余。由此及彼,我不禁想到了“钱学森之问”,想到了社会和学界经常提及“为何当代出不了大师”等问题。作为学者的我以及我们,在为自己学问感到惭愧的同时(应当坦率承认,我们在学问和修养诸方面与先辈相比,存在着甚大的差距),不能不对我们目前奉行并往往被贴上“科学”标签的这套僵硬的“量化”学术评价体系深表忧虑;相反,而对以前老先生所处的学术精神文化气候,乃至80年代的学术生态环境多少产生丝丝怀念。这也是我们在编纂“系史”时,经常挥之不去的体会和感受。

有人将当今时代称之为“量化时代”。这种“量化”也许是社会文化现代化所难以完全避免的,特别是后发展国家为了跟上“迟到的现代化”而采取的跨越式发展战略所必须要付出的历史代价。面对这种盖天铺地、无所不在的“量化”,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中文学科也许无能为力;但我以为我们却可以而且应该对之保持应有的警惕和适度的超越,不要太过这些“量化”指标所拘。特别是学科负责人、带头人、学术骨干,包括想在专业领域有所作为,希望为今后中文“系史”留下一点东西的年轻学者,对此更有必要保持一份理性的态度。

也正是基于这样考虑,我们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文系青年教师座谈会暨国家社科基金申报专场”会议上,在鼓励青年教师积极申报的同时,也向他们提出了“要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并将申报课题与以往研究特别是与未来长远的研究计划结合起来,要与自己构建的学术‘根据地’结合起来”的要求;会后还组织各学科对此进行集体“把脉”,希望将个人的课题研究与各学科的整体

研究结合起来。最近几年,浙大中文系拿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相对较多(如今年拿到9个项目),其中还有重点、重大项目,但我们没有任何的窃喜,相反有点战战兢兢。因为我们知道,课题毕竟只是课题而不是成果(严格地讲,它只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我们不必将它的功能价值过分夸大,将课题转化为成果还需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劳动。从长远的角度来讲,是不是课题以及是什么样的课题,都是不重要的,甚至是无所谓的;关键是看你的学术质量,看你的研究是否推动了学术进步,为学术史提供了前人所没有的新的东西。

当然,以上只是举例性质。其实,除“量化”之外,还有在经费投入、政策制定、学生招收(特别是研究生招收)、专业增设等方面都存在着类似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理轻文以及由此导致对人文学科特殊性的忽视等,还有相当的市场。再加上大的时代环境的催化和影响,这就不期而然地导致了中文学科地位的相应下降,甚至被不适当地“边缘化”了,程度不同地陷于困境。上述这些问题,有的与历史特别是历次政治运动干扰有关,有的与现有的体制有关,有的则带有时代通病的特点,是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性的普遍症候而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中国可能更突出)。不必讳言,这其中当然也有的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包括面对时代变革和社会发展,囿于固有思维观念和学术陈规,不能有效地作出理性回应,也包括抱残守缺,或简单照搬西方理论和方法,缺乏原创精神等等。这些都需要作反思。实践表明,中文学科是支撑一所大学尤其是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阿基米德点”(还有一个是数学学科),它具有超越一个狭义学科组织单位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价值,会对全校乃至全社会的整体精神文化产生重要的辐射和影响作用。因而历来受到主政学校领导决策层的高度重视。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苏步青等名冠中外的老校长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中文学科也不负上述这些老校长和时代社会厚望,在百年发展过程中为时代社会和民族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浙大中文学科作为东南学术重镇也不例外。从1920年之江大学(那是现代意义上的浙大中文学科的源头,再往上它还可以追溯到1897年的求是书院)以迄于今,尽管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一路走来,分分合合特别复杂,因分分合合必然导致对体制有一个从适应到不适应的过程;也尽管我们现在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有些甚至相当严峻;但在学校和相关部门以及广大教师的大力支持下,在学科建设方面还是作出了许多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按照学校统一规定和要求,取消了教研室而代之以具有实体运转的5个研究所,强化和突出了学科及研究的重要性;在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改变原来比较传统单一的汉语言文学,而向古典文献、影视动漫和编辑出版多方面拓展;配合学院,“走出去”,在海外开办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生班,招收“中国学”学位国外硕士研究生;创办《中文学术前沿》刊物;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推出一套涵盖中文各二级学科、总计40余部的浙大中文系教师学术丛书《钱塘新潮文丛》;即将推出体现我们“经典文本解读与文献史料并重”教学理念和研究理念的2套总计16卷的《中国语言文学经典教程》、《中国语言文学核心课程作品与史料选》;举办系列“启真”学术沙龙,组建涵盖各二级学科青年学术团队并经常召开学术会议、承担有关项目;强化对学生的科研的训练和指导,并注重其中的尖子生培养,近些年来已有2位本科生的论文刊发在权威杂志《文学评论》等等。

大量事实表明,目前中文学科正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特殊的历史“拐点”上。在“经济中心”时代,中文学科要想返回到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引领风骚、独占鳌头的辉煌时代(如五四,哪怕是80年代),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在时代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合力”作用下,经过我们的内外兼修,当然也包括借鉴和发掘以往丰富的历史经验、学术资源,及早采取应对措施,减少其负面效应,而在现有基础上有所改善和提高,这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决定,这为中文学科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和政策的支撑。现在的关键是把握时机,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寻找浴火重生的突围和发展之路。

那么,未来中文学科怎么进行突围和发展呢?我曾在“系史”代序中联系浙大中文系的实际,试就以下五个方面和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粗浅想法:按照学术规律行事,力戒浮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协调西学方法与传统学术的关系,努力寻求新的突破口;探寻个人与团体相结合的新的学术运行机制,在主流学术圈里发出有力的声音;参与跨文化跨语际跨学科的对话交流,在国际舞台展示自己,拓宽发展空间;积极介入当代社会改革和文化建设,使之成为当代思想文化创造者和人文精神建设者。

我以为,上述所说的不仅仅是浙大的,在当下中国大陆的高校中恐怕也有相当的普遍性。这里每个问题似乎都比較重要,限于时间,也是为了紧扣本次会议有关“全球视野”的主题,下面我拟就其中有关国际化问题稍说几句,以概其余。

关于国际化问题,这几年谈得比较多,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文化交流的深入展开,中文学科的国际化将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这个学科一个新的生长点,新的发展空间,并进而在内涵、外延乃至从课程体系、授课内容到讲授方式方法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是可以预料的。当然,这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目前还没到这个层次。现在所谓的国际化,更多的是通过召开或者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这种“交流”方式,从他人那里“引进”(包括引进海外汉学),而“输出”的则很少,在“引进”与“输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贸易逆差”。最近几年开始注意到“输出”,包括翻译和到海外开办孔子学院。但这基本属于初级阶段,成果有限,大多也停留在浅层次。针对这种现状,我认为当前及今后的国际化有必要强调在文化自觉、自信基础上的文化创新,尤其是带有“原创性”的文化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进入国际学术的“主流”并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声音,为世界和人类文明作贡献而真正受到人家的尊重,使中文学科真正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而这,当然很难,但又是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中文学科能否国际化及其国际化程度如何,最后又取决于我们自身精神学术质量特别创造、创新的能力,取决于我们能否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他人所没有而又契合时代精神文化的新的东西,能否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是很难真正走向国际化,即使“走出去”了,那也只能是浅层次的。

基于如上的事实和道理,回到本文的标题上来,我以为中文学科不妨可选择如下的应对策略:这就是立足现实,背靠历史,面向世界和未来。我们编撰中文系史,总结中文学科的历史经验,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为了推进它在当下更好地突围和发展。今天毕竟是21世纪,中文学科面临的环境变了,在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换,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大背景下,时代社会对中文学科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要求;而中文学科事实上也在发生变化。在这样情形之下,简单地循守或照搬过去的做法,恐怕是不合适的,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像有些做法一样,用诸如文化企业、文化管理等来取代中文学科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不是在解决而是在回避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中文学科历经百年积淀下来那种执着求真求是精神却永远不会过时,值得我们很好的继承并发扬光大,它对我们疗治当下学术浮躁浮夸学风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当然,这是年轻一代“中文人”的事,作为“50后”的我及我们已完成或基本完成历史使命。中文学科今天和未来怎样突围和发展,中文系的“系史”怎样写,主要是靠比我们年轻的一代——即中文学科中的“60后”、“70后”乃至“80后”们。他们这一代比我们有许多优势,当然时代社会也对他们提出了不同于我们的更高的要求。我及我的师辈这一代在学科建设问题上,大体可划归为政治化或准政治化的范式,我们的着力点似乎更多在政治与学科之间协调,经济与学科之间关系我们多少也接触到了,但刚刚开了个头;而他们这一代主要面对的就是经济与学科关系这个新课题。他们怎样用“太极推手”化解这个时代课题和难题,现成的结论和做法似乎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但以他们的知识结构,以及中文学科百年沉积而成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我们相信他们会有能力化解的。从这个意义上,今天讲中文学科建设,没有理由不将学科接班人培养问题当作当前的首要任务。

全球化语境下中文学科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中文学科建设：历史经验与全球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张广海 楼 培

2011年11月5日至6日,由浙江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中文学科建设:历史经验与全球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丛书首发式在杭州花港饭店举行。来自斯洛伐克科学院、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与浙江大学中文系教师、学生和杰出系友代表等百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新华社、《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等多家媒体与会并报道了大会盛况。会议由浙江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汪维辉教授主持。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莅临会场,对会议的召开表示了祝贺,并从制度与政策的层面为中文系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规划和建议,表达了对中文系未来发展的大力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教授、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李隆献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沈阳教授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代表发言表示祝贺与赞赏。浙大中文系老主任吴熊和教授、陆坚教授发来贺信或致辞。《光明日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叶辉作为系友代表发言。浙大中文系主任吴秀明教授以《中文学科:文化强国战略下的突围和发展——以浙大中文系及“系史”为契入点的一种探讨》为题作了主题发言。

此次研讨会召开的直接缘起,为浙江大学中文系为纪念自己走过的近百年历程,编撰三年推出了全国第一套中文系“系史”丛书——《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以下简称《系史》)。这套《系史》丛书计3卷、洋洋146万字,全面记录了浙大中文系在近百年的风雨历程中所收获的丰硕成果。而触发研讨会召开的更深刻原因则植根于目前中文学科所遭遇的世界性生存与发展困境。《系史》的编撰是对浙大中文系近百年历史经验的一次全面总结,借此机遇,汇集其他高校中文学科的发展经验,以便群策群力、对目前中文学科所遭遇的困境提出对症良药,正是召集此次研讨会的最根本诉求。研讨之主旨,约略可归纳为以下四项。

一、《系史》编撰与浙大中文系之历史经验

当下,与热闹非凡的高校校史编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系史(或院史)编撰的落寞,目前中国高校仅有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有专门的《系史》出版。浙大中文系三卷本《系史》虽不能称第一部《系史》,然而亦可堪称到目前为止中国高校首部规模宏大、收罗丰富的《系史》丛书。

《系史》于2011年10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分“总论卷”、“教师卷”和“校友卷”三卷,由浙

大中文系主任吴秀明教授领衔任总主编,吴笛教授、陶然副教授、黄健教授分别任分卷主编,先后组织了70位左右的中文系在读本科生、研究生,历时三年编撰而成。这套《系史》收集了详赡的浙大中文系历史资料,并以独特的形式,对浙大中文系走过的近百年历史做了回顾。其中“总论卷”以“百年扫描”、“行政管理”、“学科发展”、“教学成果”、“学术成就”等五个部分,梳理了浙大中文系百年发展和奋斗历程,展示了其辉煌成就;“教师卷”分“九派奔流,浙学明昌”和“惊鸿泥爪,典则犹光”两编,以学术传记的形式,展现了自清末以来浙大中文系210位历任教师的风采;“校友卷”则分“绚烂春华”与“叶茂秋实”两编,上编以学生活动为中心,概述了中文系的历史轨迹,下编则为463位系友代表作了小传或专访,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人生及为社会文化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可以预见,这部《系史》必将成为此后中国高校院系史编撰的借鉴范本。

研讨会的第一项内容便是《系史》首发式兼座谈会。总主编吴秀明教授介绍了这部丛书历时三年采编完善的曲折过程,并希望通过《系史》的编撰,一方面彰显中文学科原有的地位,让社会能够真正认识和了解中文,另一方面将中文系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学术传统进行梳理和总结,作为重要的精神和学术资源,为未来学者感受浙大中文教育提供真实记录。吴秀明教授还特别介绍了《系史》的编撰体例,即走出常见的“年表+史传”的模式,采纳以史传为主,兼顾教学、科研、学科、行政管理、对外文化交流、年表大事记的开放架构,以便全相式地展示浙大中文系的历史、现在及其方方面面,尽可能与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实践对接,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浙大出版社黄宝忠副总编辑则对丛书的出版过程作了介绍。

众多专家学者和高校中文学科掌门人对《系史》编撰过程中付出的努力表示钦佩,对其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赵世举教授认为,这三卷书不仅是浙大中文系的一部史书,也是一部中国中文学科的发展史,通过这部史书可以对中国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获得一个清醒认识;同时,它也是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一部学术史,是中国中文教育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这部书的出版,不仅有功于浙大中文系,也将惠及整个中文学科。

浙大中文系前任系主任陈坚教授对《系史》的出版表示了欣慰,并深情追忆了浙大中文系在各个不同时代尤其是在逆境中励精图治、不废学术的事迹,以切身体验勉励年轻一代学者发挥老一辈心无旁骛、厚积薄发、独立不倚、求真务实的研究精神,再创浙大中文系新的辉煌。陈坚教授还总结了建系迄今浙大中文系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提出中文学科发展的必须要有宽松的外部环境、宽阔的学校后台以及宽厚的领导胸怀,希望领导层从上到下改变重理工轻人文的观念,逐步理解中文学科的自身特点,使人文学科迈出更坚实的步伐,为一流综合性大学增加亮色。

吕建明、赖文洪、费建明等系友代表,分别从自身的创业和发展经历角度,回忆在中文系受到的熏陶和煦育,并对当今时代社会中人文学科的作用与意义做了探讨,对人文教育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职业规划问题颇有启发。由《系史》编撰所引发的浙大中文系发展经验,为其后的会议研讨提供了丰富的话题资源。

二、功利化时代中文学科的困境与突围

在功利化思潮的冲击下,人文学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危机。如日本学者三好正男所曾论述的:“今天,在正在蜕变为完全的研发基地的大学里,要明确自己的学术方向并不是一件小事情。管理者似乎很想将人文学轻描淡写——使它降低到作为控制少数人的工具,或者只是社会‘精英’机构训练大都会仪态、风格和时尚的管理培训项目的地位。”^①正因此,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下走

^① 三好正男:《正在被收购的象牙塔》,沈园译,载哈佛燕京学社编:《人文学与大学理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21页。

出困境并开创中文学科的新局面是本次会议的热点之一。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本是一门底蕴丰厚、学脉绵延的古老学问,诞生过众多备受世人崇敬的大家,其治学态度常被形象地描述为“板凳要坐十年冷”;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也一直被视作最为基础的人文学科,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然而在当下,时代车轮的飞速旋转似乎需要卸载掉若干重负才能更好前进,于是“无用之用”、不能直接服务于社会,为其提供 GDP 指标的中文学科,就再也无法享受昔日的荣光,而面临着备受冷遇甚至末位出局的处境;而不合理的学科评估体制,又诱使无数研究者违背中文学科的治学规律,扔掉“冷板凳”而把大部精力消耗于快速出成果以及跑项目抢课题上,学术质量反而变得次要。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在当下功利化思潮泛滥之际,中文学科在许多大学的地位日趋边缘,而这一局面的强化不仅不利于大学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对中文系的发展也提出了严峻挑战。

自然,困境下的反思也并不缺乏。中文学科在当下的时代应该如何自处、合理的学科发展规划制又该如何建设,这些紧迫的问题已经引起世人的足够关切,中共中央在最近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也提出“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问题的解决、环境的改善,取决于众人的努力。在当下,转机的出现,既是中文学科同人的期待,更是必须肩负的使命。

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李隆献教授介绍了台大中文系的沿革与传承情况。台大中文系学科建设特色明显,注意兼顾融通学术思想、语言文字、古典与现代文学三方面,多元而均衡。而目前的困境在于:在经济主导下,人文学科受到一定的忽视,教师队伍受到裁员;随着台湾政治、经济局势的发展,台湾研究方兴未艾,分流了部分中文学科资源;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传统研究变得越来越弱势,经学与古典文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忽视;中文学科担当的传统价值观教育也面临巨大考验,与现代人的思维越来越拉开距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沈阳教授以增设语言学为一级学科的努力失败为契入点,论及自己对中文学科的困惑与认识,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回溯了语言学学科发展的曲折历程,分析历史与现实原因;并以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为借鉴,认为中文学科应有危机意识,呼吁各高校中文学科同仁抓住发展机遇,加强沟通交流,疏通阻力压力,促进中文学科的地位升级,改进中文学科的整体构架。原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陆坚教授在开幕致辞中,以浙大等中文系发展为例,指出了中文学科在重理工轻人文的办学思维下的劣势处境,并期待教育政策能够充分重视人文学科的特殊性,从而为创办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增色。与会学者就此畅所欲言,对中文系学科的升级与内部结构设置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学界外观察者的批判则更为犀利。《光明日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叶辉高级记者作为系友代表发言,他在深情回顾在浙大中文系学习的收获与感悟之外,对当前人文学科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缺失表示了痛心。叶辉认为,其原因在于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着眼长远,而高校普遍对人文学科采取理工科评价的管理方式,驱使学者为发表论文和争取项目不遗余力,此一状况今日已亟待反思和改变。其表征即为,北洋时期经济困窘,但大师频出;今日大楼林立,大师却罕见。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目前人文学科盛行的量化评价体制并不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如浙大中文系主任吴秀明教授所言:“学术评估日益指标化,‘研究课题’的量化进一步取代了‘研究成果’的量化,在这些新的衡量指标的管束下,静下心来搞研究变得愈发困难。”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徐兴无教授也认为,中文传统学科与现在的评审机制可能格格不入,上一代学者主要为物质的办学条件发愁,现在则进入了学科资源的配置阶段,由此导致高校产生许多短视功利化行为——比如为学科点评审而致使人才畸形流动、中文系纷纷改建为院。

此一困境同样植根于高校的功利化跃进思维。与会学者指出,高校学术成果的突飞猛进很难讲已经使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高校的距离更近。至于如何突破,学者们认为在“守正”的基础上寻求“创新”已是当务之急。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认为学者须有意识地寻求创建共同体,

谋求自管自治,改革人文学科的资源分配制度,抵制功利化思维。曾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文部主任的香港中文大学冯胜利教授,则依据国外项目的评审标准,倡议项目评审打破关门封闭的状况,充分重视专家的独立意见。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赵世举教授则依据武大经验指出,中文系不应逃避应用研究的项目申请,可尝试用应用研究争得的资源维持基础研究的发展。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面对困境决不能坐以待毙,而必须直面当下的挑战,为自己恰当定位,并利用已然改善的外部物质条件,寻求新的表达自我、介入时代的方式。

三、加强本科教育、协调科研与教学的均衡关系

研讨会的另一中心内容则为呼吁加强对本科教育的重视,协调课题申请与教学实践之间的紧张及冲突关系。学者们都认为,高校毕竟不同于研究院,高校教师的职责除了搞研究之外,基础的教学工作同样重要,两者不仅应该均衡发展,更应该互相促进、良性互动。高校的学科建设本就应该包含科研与教学二项基本元素。而目前,后者之偏废已亟待重视。对于本科教学工作,学者更普遍给予高度重视,认为此为人文传承及学术延续的最关键所在。证诸史实,诚然如此。比如为世人津津乐道、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高峰的西南联大,其卓越并不在于整体科研水平的高超,而源于其本科生教学工作收获了丰硕的成果。而在当下,不仅科研水平未见得有多大提高,对本科教学工作的忽视则日益明显,其不良后果则可能很快就有突出显现。鉴于此,学者纷纷展开反思。

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李炜教授强调了加强本科生中文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他指出,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不仅要有一流的中文学科,同时必须有一流的本科生。本科生对学校建设的回报以及学校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学校应将眼光与精力放到本科生的培养与教育上,采用适合中文学科的做法,增强学生的中文基本功与职场技能锻炼,营造中文学科的独特品质;而在项目课题满天飞的当下,强调本科生教育更有重要现实意义。李炜教授并且介绍了该校富有成效的本科教学经验,表达了顶住压力不盲目跟风搞“通识”教育的决心。

温州大学副校长、人文学院叶世祥教授指出在目前浮躁的学术环境与教学生态下,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各种指标上,而忽略了教学内容与质量。他认为应当通过加强基本功训练提高中文人才的含金量。叶世祥教授依据中文教育的独特性,指出了忽视本科教育的严重性,认为将可能导致学生一无所获。在他看来,高校把精力集中于课题项目上,并逐年扩招,导致且加剧了这一局面。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沈立岩教授也特别强调了本科教学作为大学教育之根本的特殊地位,并为改变目前本科教学受到普遍轻视的不良现状提出对策,特别介绍了南开正在把教学与科研做适当隔离的尝试。在他看来,应该给老师减轻科研指标的压力,少用层出不穷的所谓的“创新”折腾老师,从而让他们能够集中精力从事教学以及研究工作。华东师大中文系副主任朱国华教授特别介绍了该校在青年教师培训与本科生通识教育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并就运作的困境及待改进方面与其他学者做了探讨和交流。

香港中文大学冯胜利教授着重介绍了美国与香港在中文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认为名牌大学以教授和学生为学校的主导,政治与学术相对分离,同时以问题驱动的方式培养学生,使其养成观察、分类、概括、演绎、预测、论证等批判性思维能力进而可以胜任独立严谨的学术研究。冯胜利教授认为,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走向的大形势下,中文学科研究应引入国际化的同行评价体系,从而走向世界,而非关起门来自居一隅。

浙江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肖瑞峰教授则指出研究生教育也是中文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目前研究生教育的问题亦颇多:一是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抵触,现有培养方案不能达成既定的培养目标;二是研究计划与研究经费失衡,现有研究经费远远不足以支撑给学生拟定的研究计划;

三是就业理想与就业市场偏离,从事专业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岗位非常稀缺;四是学术品位与学术环境冲突,评价体系与学位要求使甘坐十年“冷板凳”的风气不复可见。针对这些问题,他认为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既要强调学术主导,让研究生博采众长,拓宽视野,锐意创新,加强学术训练;同时要强调德育为先,督促研究生严格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而教师则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则提议中文学科主动承担起人文审美教育的功能,以培养健全而富洞察力的人性,为中文系学生进入社会培养竞争力。陈思和教授结合自己长期从教及任职中文系主任的经验,论及对当前中文教育两个问题的思考。一是知识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他把目前中文系的教育归属为知识教育,认为偏重于让学生学习与掌握中文学科方面的知识,而实际上中文系更应该倡导人文教育,这种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启发性的教育,把人自身的存在以及与生命聚合的人文自觉发掘出来,引导学生思考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来履行个人对世界的担当,只有通过有特殊内涵的人文教育,才可能使受教育者获得启蒙。中文学科具有感性的特点,在人文教育可以起到基础作用。第二个问题是中文教育所承担的两种功能,即普及教育和精英教育。陈思和教授认为,人文教育对每一个人都应该普及,即施行所谓的通识教育。文史哲专业应该承担起对其他学科进行通识教育的任务;而对本专业的教育,还要培养未来的人文教育者。目前关键的问题在中文专业高端人才的培养上,应该重新拟定培养目标,避免过度扩招,努力培养中文学科的专业学术人才。同时,制定适合人文学科特点的标准,使人文学科走上良性的发展道路。

学者们普遍认为,改善目前的困境,同样依赖于在制度层面改变目前的学术评估体制。而体制的改变,依赖于每位中文学科领导及同人的努力。

四、中文学科的建设与未来发展路径

研讨的第四项主题则集中于学术发展的规律内部,即主要从学术视角探索整个中文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教授指出,目前中文系的问题意识和批评意识仍需要磨炼。他以《文学中的自我审视》为题,对东西方文学中的自我形象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中国文学中缺少把自我对象化的审视,形成个人和世界的隔阂与对抗的局面,而真正伟大的文学都需要一种自我批判的精神,进而提出文学研究要有比较眼光、问题意识和批评意识,探索中国文化的特色,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影响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冯胜利教授则从国际比较的眼光,透视了当下中国高校中文学术发展的问题。他概括了三种学术研究的范式:以问题驱动的研究范式、以知识驱动的研究范式和以理论驱动的研究范式,并认为中国学界往往只重视最后一种范式,因此导致跟着西方的理论走,而无创造的能力;为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加强中文学科研究中批判性思维的锻炼。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旦教授对此表示赞同,并从跨学科的视角探讨了中文学科打破学科界限、实现突破的可能性。

斯洛伐克科学院的马利安·高利克教授作了“跨文学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以茅盾为例”的发言,从茅盾的文学创作出发,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跨文学性问题,展示了欧洲汉学界的比较研究方法,以求在国际视野下推进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香港浸会大学美籍学者费乐仁教授则以“欧洲和北美语境下有关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为题,介绍了德国、瑞士、法国、英国及美国等多个国家的汉学研究概况以及汉学教学、研究人员与学生的基本情况,探讨了在这些汉学研究机构里中国文学所处的地位、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以及中国文学及研究著作的翻译问题,可资国内中文学科借鉴。

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的佐藤晴彦教授、韩国高丽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东天教授均介绍了所在学校中文教学经验,他们所采用的细致入微与生动活泼的中文教学方式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兴趣与

热烈讨论。佐藤晴彦教授强调了该校中文学科对培养学生汉语实际运用能力的高度重视,以便使学生能够在灵活运用汉语的基础上进一步拥有丰富的中文专业知识。佐藤教授具体介绍了该校的实践经验:在初级阶段进行近乎苛刻的发音指导,务必使学生正确发音,由此激发学生自发和积极的说话欲望;中、高级阶段分别设置“听、说、读、写”课程,逐步培养学生运用汉语的实际能力,同时使学生掌握与中国有关的文化修养和社会知识;“专业课科目”设置中国的语言、文学、文化、社会等专业课程,提高学生发现课题、进行理论研究的思考问题的能力。张东天教授首先介绍了韩国学生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学的情况与困境,接着以“中国现代诗歌选读”课程为例展示了多媒体手段包括视频、音乐、图片等的综合应用,使学习信息立体化,在学生对中国了解不足的情况下增进感性与理性方面的认识,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使课堂气氛充满活力。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孙郁教授则表达了对文学史教学模式的反思。在他看来,传统的学院派文学史,过多依据核心作家的谱系叙述,而遮蔽了许多文学史上的民间鲜活内容,由此也阻断了学生对文学的情感体味能力。孙郁教授特别介绍了人大文学院正在进行的文学史教学模式改革,比如聘请作家讲授文学史,引发学生对作品文本的关注;在文学史教学中利用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资料收藏,让学生直观了解历史材料和作品版本,进而触摸历史、体察文学史的多面和复杂性等。

本次会议中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中文学术传统与当前学科建设接轨的问题上。南京大学文学院徐兴无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廖可斌教授,分别提出了传统学派和地域性学术传统的现代转型问题。二人都认为,各大学在保持开放姿态的同时,应该注意经营自身的学术传统和特色。这些传统的优势因素,可能正是中文学科未来的增长点和发展动力所在。

徐兴无教授以程千帆等老一辈学者创建南京大学古典文学研究团队为例,提出学科建设要有自觉意识,确立适应中文学科发展的长远目标,有意识进行学派建设,形成独特的治学方法和范式,保持宗风不坠、源远流长。廖可斌教授则提出学术一体化与地域学术传统的问题,如浙西博雅、浙东专家的地域学术传统特色在当今学科建设中如何继承,认为应该从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上对传统加以总结提升,加以体系化,以促进学术研究发展。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沈松勤教授则从中文学科内部建设的角度出发,对建设有个性的学术队伍的方式进行了探讨。认为应该在原有的学术传统基础上有所突破创新,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逐步形成学派风格,进而实现和合之学与专门之学的结合,借助和合之学的视野,推进专门之学的发展与深化,凸显学术个性,增强竞争力。

浙大中文系主任吴秀明教授从宏观视野审视并反思了中文学科的当代困境,并总结出五条突围的路径:按照学术规律行事,力戒浮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协调西学方法与传统学术的关系,寻求新的突破口;探寻个人与团体相结合的新的学术运行机制,在主流学术圈发出有力声音;参与跨文化跨语际跨学科的对话交流,在国际舞台展示自己,拓宽发展空间;介入当代社会改革和文化建设,成为当代思想文化创造者和人文精神建设者。以上总结与反思获得与会学者的普遍认同。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还有《系史》三位分卷主编吴笛、黄健、陶然,来自浙江省社科院和省属高校系统的领导专家林吕建、费君清、王建华、马大康、吕立汉,以及浙大有关部门领导和中文系专家学者王家平、沈文华、彭凤仪、徐枫、何春晖、张梦新、黄华新、楼含松、颜治茂、韩泉欣、金健人、徐亮、周明初、孙敏强、林家骊、徐永明、姚晓雷、黄擎、陈建新、王小潮、陈东辉、郑淑梅、陈洁、叶晔等,其中有的还在会上作了发言。《系史》三位责编宋旭华、王萍、胡畔也参加了研讨会。

综览与会专家的讨论,既有回顾总结,又有前瞻设计,既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又不乏深刻的学理思考,为中文学科的整体建设与人才培养提供了颇多建议性意见,对于进一步促进中文学科在全球化进程下参与世界文化建设、丰富人类文明成果具有重要意义。整个研讨会贯穿着浓郁的忧患意识,气氛热烈而真诚。与会学者直抒己见,既对目前中文学科发展中存在的诸多不良学术规制

深表痛心，更多方献计献策，决意不避艰难、奋力前行，表达出对中文学科发展的强烈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意识。感慨于学者们的忧思，或许我们可以用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在百年前发出的警告作为本篇评述的结语：

尽管整个世界似乎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这是就“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非通俗意义而言的。大学将以这种方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力求建造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性格与智力贵族，以此来取代世袭贵族并与逐渐萌生的金钱贵族相抗衡。^①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① 欧文·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沛、张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百年缩影

——读《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有感

李隆献 刘文清*

一、身在其境：《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首发现场

2011年11月5—6日，在迷人的西子湖畔、浙江著名的花港饭店举行了一场近年来影响中文学界至为重大的国际会议，那就是浙江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中文学科建设：历史经验与全球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除了大陆十多个一流大学的文学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教授之外，还有斯洛伐克、日本、韩国、香港等地大学中文系的主任、教授参与了这个盛会。忝为台湾唯一受邀出席会议的代表，本人也一起见证了这中文学界的盛事。会中除了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外，更见识了浙江大学中文系老、中、青三代的菁英学者，深觉与有荣焉。

浙江大学中文系这次的国际会议，除了针对中文学科的未来发展共谋对策、提出建言以外，另有一件中文学界的大事，那就是《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的隆重出版。本人躬逢其盛，在11月4日晚上到达杭州后，即领到了三大巨册，将近一千五百万字，图文并茂的皇皇巨作。迫不及待的，我便彻夜未眠的抢先拜读了。

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吴秀明主任再三诚挚邀请我对这部巨著发表感言。本人既感荣宠，更觉惶愧。但因本系刻正进行《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稿》之重修补订工作，遂邀请主持此项工作的刘文清副主任共同参与，既本“野人献曝”心理，亦取“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之意，草成此文，谨就教正浙江大学中文系诸博雅君子，并请国内外中文学界大方之家不吝赐教，实所盼祷！

二、野人献曝：敬读《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

有幸拜读《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追忆浙江大学中文系成立百年来，在时代风云不断激荡下，所谱写出既辉煌又沧桑的历史。诚如吴秀明主任于序文中所言：“浙大中文系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大书”，而这套系史正是这部大书具体而微的缩影，翻开每一扉页，都具体可见浙大中文系挥洒文学巨笔所精心书写下的一字一句，而字里行间蕴含的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与教育风貌亦隐然若现，令人掩卷怀思。

本书之编纂起于2008年，前后历时三年有余，成立专门的系史编委会，由吴秀明主任担任总主编，吴笛、黄健、陶然三位先生担任分卷主编，并动员70位左右中文系本科生及研究生，投注相当的

* 李隆献，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刘文清，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副主任。